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80年代，由里根和撒切尔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思潮占据主流，弗里德里克·海耶克、密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难以称为支撑生命的“思想”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开始流行。进而，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和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涤荡了社会主义世界，最终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为契机，东西冷战体制迅速走向崩溃和终结。

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在“无思想”的状态下继续对国家政治保持沉默，未能出现80年安保和90年安保。进入后冷战时代的90年代，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动的时期，在“国际贡献”论的压力下，日本的国家体制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向海外派兵的道路：从参加PKO、PKF，到1996年重新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防卫新指针）导致的日美同盟关系强化、日美共同开发MD（防卫导弹）计划、1999年出台“周边事态法案”，进而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制定了“伊拉克特措法”。

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经济停滞和丧失自信的“空白的十年”。作为其反动，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否定所谓“自虐史观”的日本新民族主义主导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并由此再次引发了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教科书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小泉纯一郎政权的长期执政，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更加突出，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认识等问题，日本与中韩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的趋于密切相反，呈现进一步恶化的态势。而浮出水面的日本民族主义依然是由缺少生命意识的“思想”所支撑的，可以称作“无根无思想的民族主义”。

有关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是竹内好生前一贯关注和不断发出警告的重大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也涉及到竹内所称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的“现代化”的方法论问题。因此，面对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必要对竹内好的思想进行重新探讨。

进而言之，在2006年的今天，当北朝鲜发射导弹引发的“危机”被大肆渲染，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威胁”也被无意识地鼓噪，以至于出现了攻击敌方基地的“攻击论”主张，迅速酝酿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成了决定着日本未来道路的严峻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尤其必须对日本社会在“无思想”状态下演变的真正含义进行深入思考。

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我个人确信，重新认识竹内好的思想对于突破目前日本的“无思想”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于2006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主持召开了以“日本、中国、世界：再论竹内好与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鹤见俊辅、沟口雄三、松本健一、菅孝行、孙歌、张宁、冈山麻子、薛毅、黑川创以及我本人，共10位学者。通过深入的讨论，会议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这一部分将参照会议的讨论，以我本人的问题意识为中心加以论述。

## [ I ]

### 知识分子与内在的民众性

“无思想的状况”初看起来与日常生活中民众的“非政治性”或者说“不关心政治”相对应。但是民众的“非政治性”与社会的“无思想”状况绝不相同。要明确这一点，首先要确认何谓民众的“非政治性”。

非政治的民众在19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曾被丹尼尔·贝尔和赖特·米尔斯等美国社会学家描述为Mass即“大众”，<sup>1</sup>所谓“大众社会理论”即源于此。这里的大众概念被与明显“关注政治”的市民（Citizen）相对照，进而“大众社会”被用作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概念。在这里，由于高度产业化导致了社会的均质化（Homogeneous），民众丧失了个性的去主体化被看作大众化及大众社会化的动因。而大卫·里斯曼有关他人指向型的“孤独的群众”的观点，也同样建立于对高度产业化社会

背景下的民众的认识。

日本的松下圭一也从50年代后期开始较早关注“大众社会”理论。松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使用“垄断资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来解释“大众社会”。在他看来，“关注政治”的“市民”属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民众，而“不关心政治”的“大众 Mass”则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高度产业化之后，将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进，而正是生活在这一阶段的民众开始“大众化”。对松下来说，如何将“大众”重新复原为“市民”是一个重要课题。<sup>2</sup>

由此看来，不论是美国的高度产业化背景下的大众社会理论，还是松下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众社会理论，都主张产业发展阶段决定着民众是关注政治的“市民”还是不关心政治的“大众”。

但是民众真地会如此简单地成为市民或大众吗？实际上，在松下圭一提出上述观点不久，当他看到1960年的“反安保运动”促进了民众运动的高涨之后，就认为“大众”已经成长为了“市民”。不仅如此，在安保条约自然生效的1960年秋天以后，当民众运动逐渐平息、民众的政治冷漠现象再次凸现，松下又开始认为是农村的“村落”（MURA）状况和城市的“大众”状况相互呼应成就了大众的“不关心政治”。当然不仅是松下，小林直树也提到了这种状况，并称之为“黑格尔所比喻的如万年植物生态一般的亚细亚的停滞性”。进而如前文所说的那样，清水几太郎在1963年也就如何克服这种状况而发表了“无思想时代的思想”。<sup>3</sup>

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因北部湾事件的爆发而正式开始，60年代初的“政治空白”状况消失，日本社会再度进入政治季节，一连串的“大众社会”类言说转向沉寂。

那么，上述被描述成在“大众”与“市民”之间摇摆的民众的形象，是否准确地把握了民众的本质？从中可以看出一种共同倾向：论者们将自身看作区别于民众的富有理性的政治性精英（即知识分子），并将自己摆到了引导“不关心政治”的民众走向政治或思想世界的“启蒙者”的位置。但是，

真地能够把自己看作是与非政治、非思想性的民众截然相反的存在吗？

一般说来，所有人都无例外地以“等身大”的自己而活着。即便是充满知性的政治性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仅仅存在于“政治世界”或“思想世界”，必然带有日常生活中非政治、非思想性的民众性。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关于政治和思想世界的言说，在许多情况下是超越了等身大的自己的世界而加以叙述的，因此通常会引起意识对日常生活的脱离，于是就出现了抛弃生活而仅靠思想存在的“知识分子”。这也正是知识分子容易产生将自己与民众加以区别的意识的背景。

而在这一点上，竹内好恰恰相反，他在保持自身作为涉及政治和思想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自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身具有的非政治、非思想性的民众性。

在这次研讨会上，鹤见俊辅和松本健一在论及竹内好关于言说的“态度”时，都提到他具有沉默寡言的特点，特别是与其友人哲学家埴谷雄高形成鲜明对比。据埴谷本人介绍，与埴谷在座谈会上的饶舌相比，竹内总是很少开口。只是当讨论就要结束时，竹内才呐呐地说上几句。可就是那短短的几句话，却具有将大家说过的一切加以完全颠覆的效果。

我个人的看法是，鹤见和松本所说的竹内的寡言，来自于他对于自身的民众性，即非政治、非思想世界的民众性的自觉。竹内曾经对近现代日本在走向战争过程中确立的“汉学”乃至“支那学”的传统进行了猛烈批判。在他看来，所谓的汉学和支那学几乎没有用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眼光来切近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和中国人。因此，那些研究也就未能把握在战乱中苦度日月的中国人的真正形象。也就是说，汉学或支那学通常只重视孔孟、诸子百家或李杜的诗篇，而对于同自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抱有顽固的轻视乃至蔑视的态度。竹内批判的矛头正集中于此。

由此可以看出竹内好对于努力仿效鲁迅“深知言辞拙呐而吐出一片肺腑之言”的姿态。日常生活

中的充满非政治性的民众对于政治世界是难以饶舌的。如果把自己摆到与普通民众一样的同样会受到伤害的生活者的位置，那么不论是何等人物，都必然会出现言辞的“拙呐”。当然，竹内并非停留在作为单纯生活者的民众的层面，他同时也是一位以面向政治和思想世界发言为职业的知识分子。这种经常意识到自身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要素并有意加以维持的做法，正是竹内好的方法论。他在座谈会上的“沉默寡言”或学正出自这一点。

与此相关，冈山麻子的报告以竹内好在1937—1939年间写下的《北京日记》为例，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分析。据说，竹内在北京的最后几个月陷入了与某位女性的恋爱中。在异国的这段恋爱经历，使竹内强烈意识到作为等身大的人在日常的“生=性”生活中的无力的自我，以及在所倾慕的女性面前无法进行有效表白的年轻的自我。在此之前，竹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微小”，并由此产生了“不写小说也行，只是不想失去作为作家的矜持而活着的恳切心情。”这段恋爱经历无疑使竹内更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微小。当然，许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不同之处在于，在北京这一成为自己的文学对象的异国空间，在决意用文学的感性来把握等身大的中国人的现实的过程中，竹内有着更深刻的领悟。正因如此，从竹内的方法论来说，当然不能将这段恋爱经历看作与自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无关的东西而予以抛弃。

## [ II ]

### 非政治与政治：以水俣病为例

从现象上看，民众的非政治性在他们开始参加政治运动而迎来政治季节之后也是一以贯之的。换言之，民众并不是在割舍掉非政治性之后以纯粹的政治性参加政治运动的。

作为非政治世界的居民的民众，以鹤见和子仿照柳田国男所称的“常民”为代表。一般说来，只要日常生计能够正常维持，常民通常不会主动地靠

拢或招惹政治。对于常民来说，政治一般总是“来自对方”。比如作家石牟礼道子倾尽半生所描绘的熊本县不知火海的水俣渔民，正是这样的一种常民。那么，对于常民来说，“来自对方”的政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水俣病最初被发现和确认是在50年前的1956年。对于水俣地区的渔民来说，水俣病正是摧毁他们日常生计的“来自对方”的东西。新日本氮肥株式会社水俣工厂在生产乙醛过程中排出的废水含有甲基汞化合物，污染了不知火海，水俣地区的许多渔民为此染上了令他们痛苦万分的水俣病，而且由于水俣湾的鱼类也受到了水银污染，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渔业也遭到了破坏。

对于水俣的渔民来说，水俣工厂本身并不是他们主动招徕的。历史地看，新日本氮肥株式会社的前身是设立于1908年的日本氮肥会社，在1950年后者解散之后作为继承公司而创建。而水俣病的发生就是在那一时期。日本氮肥会社早在1932年就开始生产乙醛，其间不断排放甲基汞（有机水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1942年水俣市月浦已经出现了后来被判明为水俣病的患者。而在新日本氮肥设立3年后的1953年，发现了被认定为第一例水俣病人的患者。

水俣病在当初被看成“地方病”或“传染病”，但到第一例患者出现3年后的1956年，熊本大学医学部的研究小组就否定了传染病的说法，指出是新日本氮肥公司水俣工厂所排废水中的有机水银所致，水俣病问题由此开始演化为“政治问题”。所谓向政治问题的演化，首先是指当地渔民为了抵抗自己的日常生活遭到破坏而发起社会和政治运动。具体说来，1959年春，水俣的渔民要求工厂方面赔偿其损害，但厂方否认系有机水银污染，结果引发了骚乱。同年11月，大约3000名渔民发动了游行示威，在厂方采取高压态势的情况下，愤怒的渔民闯入工厂。这一事件被称为“渔民暴动”，水俣病也开始受到全国的关注。这时距离第一例患者出现已长达6年。

曾经参加支援水俣病抗争运动的谷川健一曾叙